

陈庆元 著

中古文學論稿

天津人民出版社

陈庆元 著

中古文学论稿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001号

中古文学论稿

陈庆元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天津市赤峰道180号)

天津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01-01086-7 / 1 · 33

定 价，6.90元

序

在我国文学史上，中古文学占有颇重要的地位。因为正是到这时，文学才真正走上自觉的道路；也正是这一时代的文学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怀有这种或那种偏见，以致较少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情况到近年来才有所改变。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亟待进一步深入。

中古文学的研究正像文学史上其他阶段的研究一样，存在着一个应该如何着手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当前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比较强调宏观的探讨；有人则比较注重微观的研究。其实这两种方法应该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一切宏观的探讨如果不以微观研究为基础，就会流于空疏，甚至因材料不实而陷于谬误；同样地，微观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宏观探索的指导，也会失诸琐碎而少所创获。具体到中古文学研究的领域来说，这两种研究工作似乎都很需要，缺一不可。例如：许多作家的生活经历、作品系年；一些作品的作者及其真伪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订、甄别。至于中古文学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当时作家如何继承和发扬前人的传统，又如何影响于后人；中古文学的发展脉络；还有像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文学的相互影响以及溶合等问题，更有待于进一步掌握全面的材料并作理论的分析。要完成这些任务，不但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还需对当时的历史和哲学以及各种文化部门有较多的了解。显然，这一工作是很艰巨的。

陈庆元同志对中古文学的研究，正是这样。他的研究中古文

学，首先从南齐杰出诗人谢朓着手。一方面他对谢朓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谢朓的经历、作品系年及诗歌的艺术特色作了详尽的考订和剖析。为了理解谢朓当年的创作环境，他还曾亲自赴安徽宣城进行实地考察。因此在他一系列论文中，能够全面、准确地掌握丰富的资料，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尤其可贵的是，他在进行这些微观的研究同时，并没有忽视宏观的探讨，特别是他密切地注意着谢朓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注意开发谢朓对唐人的影响。这样，他对谢朓的研究并非孤立地研究某一个具体的作家，而是把这位诗风应变的杰出代表和当时整个文学发展的趋势以及在整个文学史上的位置紧密地结合起来。显然，这样的研究既是从谢朓生活的经历研究他思想的发展，又是联系其他作家，探讨他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这种研究方法自然是符合辩证法的。

陈庆元同志的研究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由谢朓而广及沈约、王融、江淹、钟嵘等人的研究。显然，他的研究正是集中在“永明”作家的身上。大家知道，沈约和王融本与谢朓同是“永明体”的创始者。江淹虽与“永明体”作家并非一个流派，但他的年龄与沈约相仿，而且他的“才尽”正在“永明”前后，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数。钟嵘是由齐入梁的批评家，与谢朓、刘绘等人都有较深的交谊。这种突破口的选择是卓有见地的。因为南北朝诗歌发展到“永明”时代，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人对诗歌的看法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以致像钟嵘说的那样竟有人“笑曹（植）刘（桢）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古今独步”的。那种意见纵使并非一致的看法，也未必正确，却也反映了当时人的自豪和“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语）的信念。从具体的艺术技巧来说，“永明体”不但一变“元嘉体”的古朴凝滞之气而转向流畅和清丽；更重要的是“四声说”的提倡和沈约关于“宫羽相变，低昂互即；若前有

浮声，则后须切响”等等的提出都对近体诗的诞生和唐诗的繁荣兴盛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北朝文学的兴起正在相当于永明年间的魏孝文帝时代，当时的北方文人，对“永明作家”也是十分注意的。《南齐书·王融传》载，当时北魏使者房景高、宋弁曾向王融求观《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更重要的是后来北朝著名文人邢劭和魏收的仰慕沈约、任昉尤为大家所熟知。因此“永明”作家们对北朝文学所起的促进作用，也很值得研究。这些事实还只是略举几例。这已充分说明了“永明”文学在中古文学史以及整个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也证明了陈庆元同志对中古文学的明锐眼光和识见。

陈庆元同志治学一贯笃实勤奋，曾受业于段熙仲先生门下，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近几年来执教于福建师范大学，结合着教学工作，他对中古文学史进行了深入不懈的研究，除了致力于“永明”作家群的研究外，还兼及到建安文学、北朝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史等重要领域，提出了许多富于独创性的见解，为同行所推服。我和陈庆元同志初交是一九八二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初次见面，就为他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之深厚及才识之高而心折。后来他到福州，亦曾藉机会几次会面畅谈，并通信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使我获益匪浅。近几年来，我虽因工作纷繁，较少会面的机会，但他发表的不少论文，我都是争取先读为快。现在，他把近年来的论文聚集起来，名之曰《中古文学论稿》，嘱我为序。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朋友、老同行，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在握管之际，回忆往事，既为陈庆元同志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但想起段熙仲先生仙逝已久，不觉临文泫然。

一九九一年九月曹道衡谨序于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目 录

序.....	曹道衡
建安游宴诗略论.....	(1)
试论曹植的五言抒情诗.....	(16)
严羽论谢灵运.....	(32)
论谢朓诗的思想性.....	(43)
谢朓诗的景物描写.....	(56)
诗传谢朓清.....	(69)
警策·完篇·流畅	
——谢朓诗歌艺术三题.....	(79)
从“池塘生春草”中来	
——论谢朓对谢灵运诗的继承和发展.....	(88)
玄晖诗变有唐风.....	(101)
玄晖独步南齐与太白低首宣城	
——论谢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10)
谢朓诗歌系年.....	(125)
论王融.....	(147)
王融年谱.....	(165)
以五色之笔 绘碧水丹山	
——江淹入闽之作考论.....	(187)
南朝入闽文士考.....	(196)
沈约文学批评六论.....	(210)
“浮声”“切响”管见	
——永明声律说的一个问题.....	(224)

江淹“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辨·····	(232)
钟嵘当代的诗歌评论·····	(236)
《诗品》品外齐梁诗人之考察·····	(248)
《〈水经注〉选》前言·····	(260)
《水经注校》标点问题·····	(272)
《〈洛阳伽蓝记〉选》前言·····	(285)
北齐高昂佚诗三首及其他·····	(302)
《古诗归》选评特色·····	(305)
《古诗笺》齐梁诗五首正误·····	(318)
一部全景观反映中古诗歌风貌的诗歌史 ——评《中国诗歌史·魏晋南北朝卷》·····	(321)
后记·····	(329)

建安游宴诗略论

明人许学夷论建安诗坛的慷慨诗风，曾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以壮其说：“刘勰云：‘建安初（按：今本《文心》作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①。《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引《说文》：“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也。”汉末，“世积乱离，风衰俗怨”^②，诗人的篇什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民疾苦，另一方面又抒发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和急切为世所用的郁结心情，因此形成了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刘彦和《明诗篇》及《时序篇》所阐述的观点，无疑必须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当我们读到许氏所引的《文心》时，发现刘勰《明诗篇》原文于“望路争驱”之后，“慷慨以任气”之前，还有“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数句，而刘勰的这几句话，又恰恰也不被现行的文学史著作和一般论建安风格的论文所引用。这样，就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建安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为题材的诗篇，是不是也同样表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这些诗篇表现了什么内容，又有什么艺术特色？它对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发展有什么影响，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篇短论，拟就这些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刘勰把曹操、曹丕、曹植的乐府分成两大类：“述酣宴”和“伤羁戍”^③。其实，包括乐府在内的建安诗歌，内容大体可用这两类来概括。“述酣宴”，即“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

酣宴”之类，范文澜先生《明诗篇》注：“如《文选》所载《公宴诗》、《游览诗》、《赠答诗》是。”今按：赠答诗有一部分仍属“伤羁戍”，如曹植《送应氏》二首其一等即是。笔者认为，用江淹拟魏文帝诗的诗题“游宴”，来概括这类诗作，或许更加贴切。

反映社会动乱，抒发理想抱负和急切为世所用的慷慨之作，是汉末社会动乱的产物；而游宴一类的篇什出现，则和建安文学“彬彬之盛”^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颇能再现当时的情景：“建安末，时余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时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楚襄、梁孝不文，可不论。汉武柏梁联句，或出伪托，不可尽信。此外，淮南王刘安，虽笃好文士，且受命为《离骚传》，食时而上，而史无游宴赋诗之载，其意在于觐觐，终被削除。因此，我国古代真正形成相对比较牢靠、关系比较紧密、时间比较长久的文学集团，要首推建安。一方面，“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⑤文坛上有了造旨很高的领袖人物。另一方面，曹操又是北方强有力的政治人物，雄才大略，“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⑥，他“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⑦。这样，在曹操的帷幄里，在曹丕和曹植的门下，就聚集了一大批很有文学才能的文人。其中有称为“七子”的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璉、东平刘桢公幹，还有吴质、杨修、丁仪、丁廙、邯郸淳等等，“盖将百计”。

在建安群家的诗作中，最能代表游宴诗的是曹丕的《芙蓉池作》（《文选》列入“游览”门）和曹植的《公宴》（《文选》列入“公宴”门）。曹丕诗云：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纍通川。
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
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
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已终百年。

曹植诗云：

公子敬爱（一作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辇，轻辇随风移。飘飘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据《文选》李善注及黄节先生考证，西园即铜雀园，西园之游即铜雀园之游，丕诗作于五官中郎将时。植《公宴》盖《芙蓉池作》的和诗。同时做《公宴》诗的，今存有王粲、刘桢、阮瑀应瑒诸作。昼短夜长，诗中流露出来的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应瑒的《公宴》诗又云：“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如果暂且撇开称颂曹丕功德的话不谈，从应诗中我们却看到了一次文学的盛会。彬彬多士，济济一堂，对文学等学术问题的探讨，有争得脸红耳赤的辩论，有心悦诚服采纳他人的意见，还有即兴赋诗，临席作赋。这不是一般酒肉朋友的寻欢作乐，而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用诗歌形式对文人聚会的记载。游宴时论文作诗，在建安作家的诗文中多有载述。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箏顺耳……”又《与吴质书》：“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

耳热，仰而赋诗。”曹植《娱宾赋》：“遂衍宾而高会，丹帷睥以四张。办中厨之丰膳兮，作齐郑之妍倡。文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吴质《答魏太子笺》：“置酒乐饮，赋诗称寿。”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四：“明月照缃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诸子游宴，有时还作诗赠答，应璩《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游宴篇什的出现，和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有密切关系；而游宴诗，则又反映了当时文学盛况的一斑。建安诗人开拓了诗歌的题材，在诗歌发展史上有一定的意义。

建安诗人，第一个写游宴诗的是曹操。他的《短歌行》云：“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契阔谈宴，心念旧恩。”诗人于酒宴之际，表达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求贤如渴的愿望。曹丕集中游宴诗较多。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拟《古离别》以下至汤惠休诗，其拟陶《田园》杂入陶集几不可别。江淹拟诗每首都用两个字概括所录诗人的风貌，他于魏文帝首题曰《游宴》。足见游宴诗在曹丕集中的重要。不过，曹丕的这部分诗作已经明显缺乏魏武“慨当以慷”的气概，嘉肴珍果，丰膳美酒，赵瑟齐讴，这些诗除了反映文学之盛这一点外，更多的是抒写“从朝至日夕”（《夏日》），“遨游快心意”的悠然自得的情趣。“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车于后乘”^⑧，前呼后拥，曹丕的地位，决定他成了游宴的中心人物，建安的游宴诗，多数也是围绕“副君命饮宴”来铺叙的。西园之游，曹丕时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位仅次于曹操，在《公宴》诗中他自然成了歌颂的对象。《芙蓉池作》，很能表现他当时的身份。曹植《公宴》诗，风格和曹丕相类，不过是奉命作和，因此衍丕语而成祝颂，看不出有多少真情实感。这类作品，子建集中还有《侍太子坐》。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小序

云：“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把遨游同忧生之嗟联系起来。曹丕立为太子后，子建一些应酬游宴之作，或许也是善处忧患的一种策略吧？至于诸子游宴诗，有叙荣感恩、一般应酬者，也有有志弗遂、冀蒙盼顾者，还有极力颂功扬德如王粲《公宴》诗者：“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以至后世有“干谄”^⑨和“乞气”^⑩之讥。

游宴赋诗，多数不出应酬、颂德。当然，在建安诸作中也有少数例外。陈琳《游览二首》云：“高会时不娱，羁客难为心。”诗人面对木凋绿叶、草殒红荣的时序变异，发出了感叹：

“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立功立德，成了该诗的主题。更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曹植，他生乎乱，长乎军，不以翰墨为勋绩，却汲汲于“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⑪。他从经国大业出发，提出了“节游”的主张：“嗟羲和之奋迅，怨曜灵之无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谅遗名之可纪，信天命之无常。愈志荡以淫游，非经国之大纲”（《节游赋》）。当然，曹植也并非不游宴。清时难得，嘉会不常，诗人甚至担心饭菜淡薄，不能让即将远别的朋友畅饮离杯。“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送应氏二首》其二）。表达了一片对朋友的真挚感情。“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在欢乐的酣宴气氛中，曹植却抒发了忧生之嗟：“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箜篌引》）。“嘉宾填城阙，丰膳出中厨。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赠丁翼》）。宴会上，子建与朋友屈膝谈心，娓娓劝勉：“积善有余庆，荣枯立可须。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曹植的这些作品，无疑都表现了比较健康的情绪，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所以建安以游宴为题材的诗篇，也未可一概而论。

《初学记》卷10“皇太子门”引《魏文帝集》：“为太子

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楨、阮瑀、应瑒同作。”主人命题，宾客同题共作，成了建安诗坛游宴赋诗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今存诗中，曹植、王粲、刘楨、阮瑀、应瑒并有《公宴》诗；曹植、刘楨、应瑒并有《斗鸡诗》；曹植、王粲、阮瑀并有《三良诗》。除少数篇章外，都缺乏思想深度。建安诗人反映社会动乱，抒发功名、理想、抱负的诗篇，都有亲身的感受和体会，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而且感情也较真挚，为情而造文，所以能振撼读者的心灵。而游宴诗，多数是应命而作，通常是为了应酬甚至敷衍，这样就不能不为文而造情，不能感人，因此，这些作品虽然词采华茂，诗人们多也想借此驰骋一下才华，由于写作动机上的先天缺陷，致使这些诗篇在建安慷慨悲凉、直抒胸臆的作品前面，显得那样的黯然无光。

二

慷慨悲凉之作，在建安诗坛占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游宴之诗在建安的存在，也是一种事实。而且，我国古代的诗评家对这部分作品还相当重视。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8首，分拟魏太子、王粲、陈琳、徐幹、刘楨、应瑒、阮瑀、平原侯植，几乎篇篇提到游宴。《王粲》首云：“并载游邺京，方舟泛河广。绸缪结宴娱，寂寥梁栋响。既作长夜饮，岂顾乘日养。”《平原侯植》首云：“副君命饮宴，欢娱写怀抱。良游匪昼夜，岂云晚与早。众宾悉精妙，清辞丽兰藻。”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拟魏文帝《游宴》云：“置酒坐飞阁，逍遥临华池。”拟刘文学楨《感遇》云：“华月照方池，列坐金殿侧。”拟王侍中粲《怀德》云：“侍宴出河曲，飞盖游邺城。”唐人韦庄说：“曹子建诗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⑩，“清夜”之篇，即《公宴》诗。建安的游宴诗，被看重如此。清人陈祚明甚至认为曹丕的《芙蓉池作》、曹植的《公宴》是“建安正格”^⑪。

当然，我们不能同意游宴诗是“建安正格”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也有正视此类诗作存在的必要。我们反对把游宴诗奉得过高，也主张实事求是，对建安游宴诗做深入细微的研究。

慷慨悲凉，是建安诗坛的主要风格。不过，仅仅用“慷慨”二字，似还不足以概括建安诗歌风格的全貌，刘勰《明诗篇》既肯定建安慷慨的时代风格，又看到子建仲宣五言诗的“清”和“丽”的方面。钟嵘品子建，曰：“骨气奇高”，又曰“词采华茂”；品仲宣，曰“文秀”。胡应麟《诗薮·内篇》卷3曰：“建安诸子，雄瞻高华。”《采菽堂古诗选》卷6评子建《公宴》曰：“以秀逸为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论建安与汉文学不同，曰：“诗赋之文，盖事华靡，多慷慨之音。”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论建安风格，以为不外“慷慨”和“华丽”两个方面。总之，建安诗坛的风格，除了慷慨之外，还有“丽”的一面。建安直抒胸臆的作品，慷慨而任气，不少诗篇已注意到词采的修饰；但这“丽”的风格，表现在游宴诗却尤其明显。当然，这“丽”也还不是南朝后期的繁丽或淫丽。因而，我们以为用“秀丽”来概括游宴诗的风格，比较恰当。

当然，魏武古朴，力戒浮华；孔融早逝，这秀丽的风格和他们绝少相干。“诗赋欲丽”^⑭，曹丕、曹植以下，秀丽成了他们游宴诗的共同风格。我们前面所引的曹丕《芙蓉池作》，曹植《公宴》，正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此外，诸子的《公宴》诗，曹丕的《于玄武陂作》，曹植的《侍太子坐》，曹植佚诗“逍遥芙蓉池，翩翩戏轻舟。南阳栖双鹤，北柳有鸣鸪”^⑮，王粲《杂诗·日暮夜西园》等，都属此类。

游宴诗的一般风格是秀丽。游宴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和慷慨悲凉不同。建安诗歌，诚如黄季刚先生所说：“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⑯。如果说，建安诗歌的一般特点，一方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平易直质，流畅自然，多用比兴的优

点；另一方面是比起古诗十九首进一步的文人化。那么，游宴诗则完全地文人化了。这些游宴之作，基本上已经脱离、或者已经背离了“闻里歌谣之质”，成了完全的文人诗了。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以是否吸收民歌的优点长处来论定一个诗人或某几篇诗作的优劣，但是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说，为文而造情的文人化的诗歌，不可能产生最优秀的作。

鲁迅曾经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⑦。建安诗人在写游宴诗时，显然更加执着地追求艺术表现手法。下面，我们拟从写景、状物的成功和字词的锻炼这三方面，来探讨游宴诗艺术表现手法的特点。

首先，是写景真切。方东树评曹丕《芙蓉池作》云：“极荒乐而已”，却又称赞“双渠相灌溉，嘉木绕通川”两句“写景如画”；“惊风扶轮毂”句“极写人所道不出之景”^⑧。的确，《芙蓉池作》的写景是成功的。吴淇《选诗定论》卷5对该诗分析得很详尽：“此诗只写‘夜行游’三字。于‘步西园’上著‘逍遥’二字，逐一细看，故逐一细写也。‘双渠’四句，是俯写游。‘相灌溉’，见池之美。‘嘉木’句，因池及木……曰‘绕通川’者，逐地势而成。‘卑枝’二句，单承写木，一卑一修，见木之嘉，益见池之美。‘惊风’二句，平写行游，惊风吹后，飞鸟鸣前，我身适在池上。‘云霞’四句，仰写夜。然何地无星月，何地无云霞：自文帝写来，亦若池上固有之景，移他题不得者。”曹丕还有一首《于玄武陂作》，写兄弟行游的光景：

“菱茨覆绿水，芙蓉发丹荣。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乘渚望长洲，群鸟欢讙鸣，萍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绿水芙蓉，垂柳重荫，更加群鸟嘤嘤乱鸣，水光潋荡。色泽与音韵，静物与动景，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有声能动之画，曹植《公宴》：“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景色之妙，非画工之笔所能摹状。刘桢

《公宴》：“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近于白描，而读后令人想见其景。

其次，状物细微。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咏物诗。试看刘桢《斗鸡》诗：

丹鸡被华采，双距如锋芒。愿一扬炎威，会战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

利爪、瞋目、劲翮勾喙，无不历历如在目前。曹植的同题之作，更为细微地刻画出群鸡对阵之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嘴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发朱光”、“轻毛散”，颇能传出斗鸡的神态，比刘诗又略高一筹。

再次，炼词炼字。慷慨之作，多是直抒胸臆，比较注意全诗的气势。游宴诗则不然，特别是同题共作之诗，为了崭露头角，争强制胜，因而就不能不更注意修饰，不能不更注意遣词造句。胡应麟说：“子桓、子建工语甚多，如‘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之类，句法字法，稍稍透露”^③。这里所引的曹丕《芙蓉池作》和曹植《公宴》，其句法字法，确很不同于古诗十九首，和建安慷慨之作如子桓、子建的《杂诗》也不相同。“夹”和“出”，“被”和“冒”，这些动词（响字）的使用，使景物更加神情生动。曹植《侍太子坐》：“时雨静清尘”，一“静”字也起到同样效果。

三

建安游宴诗，虽然在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有其特色，但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这个角度来考查，它比慷慨悲凉之作